

崇川往事

北京的“南通会馆”(下)

□吴松延



青年徐赓起



季自求(1941年)



1930年代中期的季自求(前坐者)

会馆，无疑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遥想当年的通州会馆，常常是乡音满屋，灯火通明，除了众多的迎来送往、寻常事务，这里还留下过张謇等人的身影。

关于张謇与会馆，张孝若的同学、南通首位留美学生徐赓起(1892—1977)在1960年曾有讲述：“张謇年轻的时候，曾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。当时，他还没有中举人，仅仅考了个秀才。一次，他待在通州会馆里闲得没事，就跑到前门外转转戏……”

是啊，当年赶考的张謇，就曾在“抵京后住宣武门外大街南通州会馆”。如光绪十八年(1892)二月二十五日，张謇在给张謇的信中就记有：“与(顾)梦璞同住会馆北院。会馆新修，又与顾、潘同一院落，拟且安之。一路疲倦，拟明日拜客。兄有讯来，径寄顺治门外大街路东南通州会馆。”由此可见，南通州会馆是张謇进京赶考时的落脚地之一。

张謇自订年谱也记录有甲午年(1894)四月(原文误为三月)“二十五日，传胪。顺天府尹(陈彝)于午门酌酒揖骑，以仪仗送归第。假南通会馆供张迎使”。可见，张謇不仅住过通州会馆，还一度让该馆暂时充当了状元府第。这一天，除了翁同龢曾到会馆道贺，张謇当天的日记还有“翟、王二公为治归第事”句，记载会馆两位主人翟伯恒、王邦鼎为其主持了迎归仪式。

第二天，“张謇的恩师——他所请的贵客来了，他们是房师高仲诚和殿试时的读卷官翁同龢、李鸿藻、志锐等人……”此后，梁启超等人也登门祝贺。《梁启超 公车上书》一书对此有一段描述：“(梁)启超约了(汪)康年前往宣武门外大街南通州会馆祝贺张謇，只见门口张灯结彩，捷报状元及第的大红报条高高地贴在外墙上，爆仗和鞭炮纸屑洒落一地，会馆管事和听差都穿了簇新的袍褂为状元公迎客，贺客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凡。”有张謇传记还写到袁世凯(袁世凯)来会馆贺，但史实如何？尚待考证。

没想到的是，在南通会馆经历大喜后，张謇又遇大悲：九月十八日，一纸急电送至这座状元府——为他辛劳一生、对其寄予厚望、在家翘首以盼的张父，没能等到新科状元衣锦还乡，却已撒手人寰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

不为众人所知的是，鲁迅也曾是南通会馆的常客。查阅《鲁迅全集》，仅该书出现的南通州会馆或南通馆、南通县馆的记录就不下六处。

自1912年来到北京，鲁迅在山会邑馆(即绍兴会馆)住了七年半。1912年12月1日日记云：“至南通州会馆访季自求，以《域外小说》两册托其转遗刘雾青。而季自求则以《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铭》一枚，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暨碑额、碑侧共四枚见赠。”季自求(1887—1944)，名天复，南通人，1902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与周作人同学。1912年5月，原在孙中山的参谋本部担任军职的季自求，在由南京赴北京至教育部任职后，就住在距绍兴会馆不远的南通会馆。

1914年8月，鲁迅又去南通会馆看望了季自求，他知道季喜欢集邮，特地带去了一批日本邮票送给他，与他一同分享观赏精美艺术品的欢乐。此外，鲁迅还向季自求借看《南通方言疏证》，并在某次到南通会馆访季时“持麻糕一包而归”。

而鲁迅的另一位好友、早期民主革命先行者、后出家北京拈花寺的刘笠青(即前文之刘雾青)，也曾常来通州会馆，与季自求这位水师学堂同窗抵掌而谈，还画了许多画赠给这位挚友。

更早关于会馆的记载是发生在戊午年(1858)的一件奇闻，酒店市(西安镇旧称)邑人、举人戴莲芬当年曾在“京师通州会馆”居住两个月，此后成为清末志怪小说家的他还将在该馆经历的怪事，绘声绘色地写成《狐打瓮》，该篇后被收入他的《聊斋志异》一书，由上海《申报》馆仿聚珍版印制发行。

1926年，张謇因病去世，在京社会名流、张謇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的

同僚熊希龄、梁启超等于9月2日在弘内广济寺举行追悼会，“并且在前几天已函知南通会馆的同乡们”。可见，这时的南通会馆，仍然是旅京南通人重要的信息交流与活动场所。

其实，随着科举被废除，会馆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。但作为同乡互助组织，到20世纪30年代，通过成立健全的机构、明确主要职能，南通会馆仍继续发挥着作用。1932年5月，以“联络乡谊，实行互助”为宗旨的“南通旅平同乡会”成立，并设于南通会馆。经票选，陈子才等五人为理事，陈石泉、季自求等三人为监事。同时订立章程，明确了组织、经费等事项。同乡会除设有教育、建设、慈济三个委员会外，还设常委会于闭会期间负责日常事务。同时，常委会设保管、文书、财务、事务、交际等五股，并规定每年召开大会一次(遇有重大事件，召集临时大会)，执委会、监委会均为每月一次。南通同乡会的建立及规范化运作，为旅居北平的乡人提供了更好的互助平台。

到了1956年，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席卷全国。在风暴中心的北京，和城内其他所有会馆一样，南通会馆也被转为公有，其房产和物品都被移交给北京市民政局和房管局。接着，原会馆内的最后一进院落被长城风雨衣厂占用，其余的房屋则被分配给有关住户——昔日的会馆，顿时升腾起袅袅的炊烟和鼎沸的人声，前院日夜变幻的生活场景与后院时起时落的生产场面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画卷，记录下一幅幅历史画面。

随着时代的推移，京城里不少老会馆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至于已被人们淡忘的南通会馆，早年居住在原址普通居民院的老人，也只能回忆起该馆大门上曾悬挂着由张謇题写的“南通会馆”匾额。如今，昔日的南通会馆虽已面目全非，重要的文物牌匾、碑刻等也早已不知所踪，但庆幸其历史建筑及传统格局犹存，保留的历史信息尚有，相较于90%已被拆除的其他会馆，已属非常幸运。如能认定其文物身份并加以修缮利用，无论对张謇研究还是地方历史文化保护而言，都将更具意义。

海陵旧话

如皋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喉传染病

□程太和

白喉(Diphtheria)是由白喉杆菌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，以发热、气憋、声音嘶哑、犬吠样咳嗽，咽、扁桃体及其周围组织出现白色伪膜为特征。严重者全身中毒症状明显，可并发心肌炎和周围神经麻痹。白喉可分为四种类型，其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咽白喉、喉白喉、鼻白喉和其他部位的白喉。成人和年长儿童以咽白喉居多，其他类型的白喉较多见于幼儿。

白喉在南通地区1953~1981年均有病例发生。1959~1960年流行，发病率为47.74~68.54每万人，以郊区为高，平均9.89每万人，城区和港闸次之；1961~1966年逐年下降，发病率为27.72~11.35每万人，城区平均发病率21.8每万人，港闸、郊区次之；1970~1981年下降为8.50~0.08每万人，城区4.18每万人，港闸和郊区略低。1982~1987年无病例报告。

1959年秋初，南通、如皋等地发生白喉。为有效控制病毒传染，南通地区在平潮镇的原“通如县政府筹备处”(1957年11月29日，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置通如县，县人民委员会驻平潮镇，下辖原南通县的祖望、沈川、努力、彦明、文俊、新坝、新民、烈士、李港、九圩、刘坝、五接、平潮、英雄、奋斗、极孝、蒋一、巩固、团结、新生、刘西、慎修、韩坝、横港、延防、秦灶、兴西、袁桥等28个乡镇；原如皋县的薛窑、一甲、龙舌、九华、中心、营防、郭家园、姜北、官杨、新姚、佳姚、勇敢、平桥、林西、林东、白蒲等16个乡镇)。经过不到1年的筹备，1958年10月国务院通知，通如县暂不设立，设立“南通白喉隔离治疗站”(此处今为南通市肿瘤医院)。

此次白喉疫情，如皋县东部、南部地区较为严重。如皋县人民医院指定专门医务人员、护理人员，另辟病房，采取隔离方式收治患者。如皋县人民政府卫生科还从如城公社医院、东陈区医院各指派一名医务人员，前往设在平潮镇的“白喉隔离治疗站”学习。医务人员学习十天后，即回原地从事预防治疗工作。如城公社建立了临时“白喉隔离治疗站”，县人民医院派出宋永祥医师、姜静兰护师等协助诊治白喉。“隔离治疗站”用中药“加减银翘散”或“养阴清肺汤”给患者内服，以“秘制雄黄散”吹喉，杀菌去腐；再用“青霉素”针剂注射以抗菌消炎(约7~10天)，防止并发症发生。“隔离治疗站”采用中西医结合方式治疗白喉，先后隔离治疗50余例，几乎零死亡(只有个别患者因耽搁时日，延误病机，导致未就诊，白喉杆菌已侵入血液而无法救治，那是极少的例外)。在较短的时间内，白喉即被控制。